

共享、重塑与认同： 集体记忆传递的社会心理逻辑

管 健 郭倩琳

【摘 要】 集体记忆不仅是被共享并存在于某个共同体中的个人记忆,亦是允许被社会成员所获取的符号系统。社会运行受集体记忆维护,集体记忆又受社会框架维持。社会心理学视角中,集体记忆可根据其受群体关注的程度和衰减速度进行划分,其传递过程是基于接受或拒绝信息的筛选过程。筛选过程主要涉及三个通道:群体成员对集体记忆相关信息的共享过程;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符号之间的互动对集体记忆的重塑过程;置于社会框架中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因此,将集体记忆研究全然“去心理化”或“去社会化”并不利于对集体记忆研究的拓展,探究集体记忆如何在社会中传递需要补充社会心理学在这一领域的可能性尝试。

【关键词】 集体记忆;信息共享;符号互动;认同建构

回忆的实践活动不仅发生在个体身上,也同样发生在集体中。个体不仅会独自回忆过去发生的事件,且乐于在“他人在场”的情境下共同检索、提取、分享并形成关于某件事的记忆。社会网络中的“他人”不限于独立的小群体,还包括范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个体的记忆内容有时甚至超越本人的实际经历,包括了对家族、某一代人、国家历史与文化的记忆等。因此,要确定某种记忆如何开始形成又何时消失非常困难,众多研究者便从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与影响机制角度,尝试解答这些孤立的个体记忆在社会环境之中是如何传递扩散,甚至演变成为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集体记忆内容。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指对过去事物形成的一种群体共同表征,哈布瓦赫(2002,第93页)在其著作中对集体记忆解释的定位认为:正像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一样,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而在心理学研究的实验范式中,集体记忆的操作定义一般为,小组成员在合作后的个人记忆中所记得或忘记的重叠项目的数量(Congleton & Rajaram, 2014; Stone, Barnier & Sutton, et al., 2010)。

社会科学家对集体记忆概念的解读指出了“记忆”这一心理现象可能包含的某种社会属性。在哈布瓦赫的解释体系中,集体记忆是一种由社会维持并存储的符号,这一符号可以被其社会成

管健,法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郭倩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350)。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17JZD04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建构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优势及其影响结果”(631924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员所获取。长期以来,心理学视角下的记忆研究主体多为个体记忆,涉及记忆的编码、存储、提取、遗忘、保持等方面。而社会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却更多的将记忆现象“去心理化”。已有研究者对这种过度的“去心理化”提出了疑问,如学者刘亚秋就认为“将记忆去心理化,或许只是作为社会学家的哈布瓦赫的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将社会记忆与心理学的记忆研究区分开”(刘亚秋,2010)。基于此,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对集体记忆的定义应该包含以下内容:(1)集体记忆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2)集体记忆不仅涉及个体大脑对信息的编码、存储、提取等过程,也受到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3)集体记忆不仅包含一种心理过程,同时也包含一种社会过程。将社会维度纳入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或许可以为集体记忆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一种更为灵活的研究框架,帮助解释集体记忆如何在社会中传递、又是如何被社会所影响的;同时将心理机制引入集体记忆的社会学讨论,也可以补充人们的心理过程对社会框架的适应特征,以及反馈路径与规律。

一、基于社会信息传播的集体记忆共享

社会传播是形成集体记忆的关键过程(Wertsch & Roediger,2008)。在社会网络中,群体中的个体是每一个节点,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或关系则是点与点之间的联结(Castellano,et al.,2009)。集体记忆的传播域,在社会网络层面可以具象化为基于结点、矢量关系、集群、界限等构成的信息传递与共享范围。在生物传染中,连续的接触导致具有独立概率的传染,而在“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中,“传染”的概率取决于前一个接触者给予的社会肯定或强化作用(Wang,et al.,2015)。人们对于信息的可信性总是寻求多重确认,在现实的社会传播情境中,记忆在个体行为的采纳和强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个体从接触者那里获得的累积信息的部分或完整的记忆(Centola,2011)。通过记忆再巩固信息不仅涉及个人对信息的识记,也包含其他接触者对信息的加工与反馈。心理学对“什么特征的集体记忆信息更容易在群体中传播”做了一系列实验室研究,并形成了成熟的研究范式。

(一) 信息社会属性与协作记忆范式

在典型的协作记忆(collaborative memory)中,被试首先独立学习一些材料,紧接着是一段长短不等的干扰期。然后被试进行记忆测试,且回忆没有顺序要求,测试阶段包括小组共同进行回忆(Rajaram & Pereira-Pasarin,2010)。对协作记忆的研究发现了协同抑制作用(collaborative inhibition),即在协作小组中进行回忆时,个体的记忆回忆量更少,研究者将这种违反直觉的现象称为协作抑制(Weldon & Bellinger,1997)。

集体记忆虽然涉及更广泛的社会范畴,但协作抑制记忆范式指出了记忆在社会中传播的某种基础:记忆在群体中的传播伴随着一种拒绝信息或者接受信息的过程。随着记忆在社会中传播的频率和广度增加,群体中共享的记忆也会增加,伴随的是记忆的准确性下降、概括性提高,而个体接受或拒绝的过程无疑与信息的社会属性相关,根据信息的社会属性一些记忆被长时间储存下来,另一些记忆则逐渐消失,这不仅是一种个性化的过程,也存在一种普遍化的集体现象。有研究表明,小组成员回忆的非正确信息往往会进入被试的最终个人回忆,如果被试认为这些信息来自社会来源(如:感知到信息源自伴侣),而不是计算机生成的反应等非社会来源,记忆错误现象就会增加(Reysen & Adair,2008)。这些研究表明,社会属性相关信息使得记忆内容在群体中更趋同,即使这一过程牺牲了记忆的准确性。

研究同样表明,个人确实更有可能在社交上分享情感上突出的信息,唤起高度兴奋的正面(敬

畏)或负面(愤怒或焦虑)情绪的内容更容易在社会中传播(Berger & Milkman,2012)。但情感和集体记忆相关信息之间的关系比简单的情绪效价对其产生影响要更为复杂。信息的社会属性会影响集体记忆传播的筛选过程。虽然记忆研究的实验心理学范式更强调个体记忆如何受到他人复述的影响,但却揭示了集体记忆在社会传播中不可忽视的心理过程,即与他人共同进行记忆提取步骤。正如新异刺激和选择性注意影响短时记忆编码与存储过程,与他人共同进行记忆提取这一步骤也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加工过程。

(二) 社会性共同提取诱发遗忘范式

现有的通信技术虽然创造了更有效的存储信息方式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但是却无法保证信息在人们所处的社会中具有持久性。社会中的记忆信息有其自身运转的某种法则,因为人们既是记忆的生产者,又是记忆的消费者,记忆活动虽被认为是众多心理活动之一,却又无疑嵌入在整个社会语境当中。社会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2007,第108页)认为,存在两种用于存储回忆的记忆存储器:身体和语言。前者是由冲动力、痛苦压力、震惊强度塑造的,被牢固的滞留在记忆中,而后者因社会沟通形成记忆框架。人在记忆的实践活动中不可避免的受到更广泛的互动背景影响,而不仅仅是个人特征。

记忆的对话行为促进了记忆收敛(Hirst & Echterhoff,2012)。人们不仅用语言向别人传递信息,还会经常互相谈论过去发生的事。对话参与者带着不同回忆内容进行对话,但经过对话行为后对话者的记忆概括性更高。当人们在谈话中选择性记忆时,不仅强化了已有的记忆,同时导致对其他相关记忆内容的抑制,使得相关记忆材料的回忆量降低,即提取诱发遗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研究发现,提取诱发遗忘现象在促进集体记忆形成中起重要作用。为了将社会维度纳入对记忆研究,在提取诱发遗忘实验范式的提取练习阶段将被试分为说话者和听众,可发现对话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听众)都会发生类似的选择性遗忘现象,即社会共享的提取诱发遗忘(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SSRIF)(Koppel, et al.,2014)。

记忆信息在连续的社会互动中具有可传递性这一特征对集体记忆的形成有重要贡献。当说话者与听众属于相同的社会群体时,社会共享的提取诱发遗忘现象更显著。如让被试阅读一个海外学习计划并播放一段有选择地讲述原始阅读内容的播报,结果发现,当听众与播报人属于同一所大学时,产生了SSRIF;若播报者是其他学校的学生时,则未出现SSRIF(Coman & Hirst,2015)。研究者认为产生这一内群体偏好可能是出于听众想要与说话者建立或加强社会关系,因此自然的选择与说话者进行一致的记忆提取过程。社会网络中的群体成员,通过彼此的群体关系建立起集体记忆信息共享的结构与机制,并依此影响着群体成员自身的观念、信仰和行为。

协作记忆和提取诱发遗忘范式阐明了一些允许信息在相互作用的个体之间传播的认知机制,但这些实验都集中在小规模实验室模拟社会情境中。因此有研究调查了大规模的、现实的社交网络,也发现个体间相互作用增加了个体记忆的相似性(Luhmann & Rajaram,2015)。这说明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言语对话和对话者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非常重要。在社会网络中,社会信息与集体记忆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社会信息传播的相关研究可以部分解释集体记忆的共享特征,另一方面,集体记忆自身特性也可以为信息传播研究提供社会心理机制的解释途径。

二、基于符号互动的集体记忆重塑

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无疑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息传递,其中言语互动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记忆以至少两种重要的方式在人际间传递,一种是经历过或真实的记忆被分享,另一种是将从未经过的信息整合到记忆中(Choi,et al.,2017)。研究者进一步将人们关于集体记忆的言语共享行为具体为人类言语行为的一类特殊表现,即“记忆言语行为”,该行为可被定义为叙述、描述或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或通常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Saint-Laurent,2017)。谈论过去既是一种对过去发生事件的陈述,也是在表演一种关于记忆的言语行为。许多集体记忆的讨论都假定各种语言形式是记忆的基本工具,集体记忆之所以成为集体的记忆,并可以被其社会成员所提取,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群体成员拥有共同符号体系、相同叙事资源。集体记忆最初是孤立的记忆,通过符号互动或叙述,孤立的记忆才会获得独特结构,并具关联性和连续性,且与其他记忆信息相互印证并最终嵌入整个社会运行体系。没有被表述出来并以各种形式参与在符号互动当中的集体记忆,在结构中是不稳定的,容易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衰减乃至消失。

符号互动不仅是集体记忆的传递与共享方式,更被视为对集体记忆的重塑。有关社会互动对记忆影响的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塑造记忆的有效方法。实验中的语言互动可以成为植入错误记忆的有效手段。研究者让被试观看一系列描述交通事故的图片,在第一次观看之后,向被试提供描述事故的额外信息,这些信息有的与原始图片内容矛盾,有的与原始图片信息一致,结果显示实验者有能力通过语言的互动给被试的回忆内容植入各种错误记忆(Loftus,2005)。由此可以合理推断,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积极参与了集体记忆的形成与重塑。

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内容涵盖实物、权力、情感、角色等,但涉及信息内容的沟通关系覆盖的网络范围更为广泛。对话类似“强化”,对于记忆表达者与记忆倾听者而言,有选择性的对记忆内容进行交流会被选择的内容强化,使之更易被提取。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是对个体与群体的联结作用,集体记忆研究对符号表征的阐述,与社会表征理论有关符号表征的论述不谋而合,符号表征一方面连接着历史和集体记忆,代表着社会宏观和稳定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也连接着个体经验,代表社会中差异性的和弹性的个体心理(柴民权、管健,2018)。此外,集体记忆既是群体所共享的,又是群体成员可以获取并挪用的,它是一种具有选择性的社会表征,承载着对一个社会群体重要的认同(Jovchelovitch,2012)。

在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言语符号占据重要位置。关于俄罗斯人对“驱逐外敌”的图式叙事模板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在叙述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时,过程中所使用的“图式叙事模板”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这一抽象化的符号系统是俄罗斯集体记忆的基础(Wertsch,2008)。这提示,群体叙事描述了群体对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类别成员的心理表征叙述,群体叙事的符号互动水平则代表集体记忆在群体中的深度,不同社会背景也会建构截然不同的集体记忆叙事模板。同一社群中,人们倾向于纠正个体的集体记忆,以符合某种公认的事实。Hirst(2015)发现,关于911事件的错误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提供了必要的纠正材料。这也是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过去发生的事件存在不甚相同的集体记忆的原因。同理,两种集体记忆的相似也可能是因为它们都趋向于被同样的叙事模板所建构。

把社会群体中的个体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关系、规则,还包括集体记忆,其中个体之间对集体记忆的交流行为尤为重要。记忆交流的时间动态会影响集体记忆的重塑过程,若对静态拓扑的社交网络加入时间序列,会发现群体间被试在早期对话中谈论关于共同经历事件的记忆会促进集体记忆在网络中收敛;反之,群体内被试若在对话早期谈论关于共同经历事件的记忆,则会减少记忆的收敛程度(Momennejad,et al.,2019)。这提示,社会网络中的记忆言语行为不仅受到静态网络结构的影响,而且受到动态时间进程的影响,由此存在更多的因素可以与社交网络的时间和拓扑特征相互作用,从而塑造集体记忆。

三、基于认同建构的集体记忆传递

尽管集体记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实践中却仍有分歧。有研究提出,集体记忆定义的核心是群体认同,如果集体成员共有的某个记忆与集体成员自身的身份认同无关,则只能算是共享记忆(Wertsch & Roediger,2008)。需要说明的是,单独分析个体特征或社会结构特征都不能更好的综合探讨集体记忆传递的系统性过程,而集体记忆与个体认同相关将记忆这一心理现象的个体属性与集体记忆及其社会属性之间进行了尝试性联结,强调集体记忆是个体赖以建构自我认同的材料。

阿斯曼延续了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观点,她主张人类不仅以第一人称单数“我”生活,而且以各种形式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生活,每一个“我们”都是由特定的话语构成,这些话语标明了某些界线,定义了各自的包容和排斥原则,并提出承认集体记忆的概念就是承认某种集体认同。而现代心理学记忆研究之父巴特利特则对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集体本身并不存在某种记忆。巴特利特主张“社会结构为个体记忆提供了一个持久的框架,所有详细的回忆都必须纳入其中,它对回忆的方式和内容都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影响”,他所支持的是“群体中的记忆,但不是群体的记忆”(Wertsch,2002)。尽管巴特利特对群体是否存在记忆这一心理功能提出异议,但也不能忽视他对记忆这一心理现象的社会维度十分关注。

集体记忆的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在形成和维持集体记忆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不在常见的记忆研究范围之内,因此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们找到了“认同”这座桥梁,使个体记忆研究与集体记忆研究之间联结成为可能,集体记忆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逐渐得以扩展。人们在集体记忆的生成和传递过程中,不仅会根据时空关系把集体记忆信息置于特定的情境和结构,还会整合共同的信念以及分享认同过程。如果信息和符号互动过程是集体记忆社会传递的结构机制,认同则是受到结构激发的网络粘合剂,推动集体记忆内容逐渐演化成为社会成员可获取的记忆表征系统。

(一) 自我认同与集体记忆易提取性

集体记忆内容有很大一部分融合了个体的自传体记忆。自传式记忆存在宏观结构,当人们从自己的生活中自由地回忆事件,并对每个事件的发生根据年龄进行编码,就会观察到除了记忆的近因效应使得人们对当前年龄阶段发生的事件记忆较多,人们普遍对青春期后期以及成年早期发生事件的记忆存在记忆高峰。同样,记忆代际同辈效应(generational cohort effect)指出,如果让被试说出1~2个过去50年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被试同样倾向于列出其在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早期发生的公共事件(Koppel & Berntsen,2015)。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内的公共事件记忆被认为比其他时期的公共事件记忆更重要,也更容易被人们提取。

回忆高峰与个体自我同一性发展关键阶段的趋势非常相似,无论是关于自身的记忆还是关于公共事件的记忆,在这个阶段都得到了深度编码,因此在个体的回忆中所占比例较大。但也有研究认为,个体自我认同形成的这个阶段,其特征更多的保留与重要他人互动的自传体记忆,而不是保留与群体和社会有关的经验。也就是说,回忆高峰的后期可能表现出对私人个体记忆的优先保留,而不是对公共事件记忆的优先保留。但记忆的建构过程确实发生在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因此记忆的功能也需要与文化的目标、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相一致。

个体在认同尚未确立的阶段投入了大量的认知努力,这种认知资源的消耗帮助其适应身心环境的变化与发展。相对于生命周期后期进行编码的知识,认同形成阶段的知识以较为特殊的方式被编码到记忆系统中。此外,在社会认同形成过程中所保留的知识可能会形成自传体记忆内容的基础,

在个体记忆系统中更易提取。这也佐证了认同建构过程对集体记忆传递的深层次作用,认同过程不仅区别了“我”与“他”,同时也在个体内心划分出“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并依据认同过程对群体内的叙事符号进行识别和编码,最终整合成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认同过程不仅参与了集体记忆的识别、编码和存储阶段,也参与了集体记忆的提取阶段。这是因为个体借助自我更相关的记忆来理解和阐释后来产生的记忆,也就是旧的记忆与新的记忆相融合、再编码的过程。

（二）社会认同与集体记忆稳健性

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SSRIF 的稳健性也会受到影响。研究者要求国籍为美国的被试阅读关于在伊拉克的士兵们犯下的4个不同的暴行事件和暴行理由,实验的控制因素为士兵国籍(即暴行的实施者被认定为伊拉克人还是美国人),结果显示,当士兵被认为是伊拉克人时产生了 SSRIF,但士兵被认为国籍是美国人时这一效应并未发生(Coman, et al., 2014)。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被解释为美国籍被试感到自身社会认同受到了美国同胞暴力行为的威胁;而当美国籍被试认为是伊拉克人犯下暴行时,他们并没有感到类似的威胁。

社会认同总是涉及内群体与外群体的识别与分类,超越了个体的动机和人格因素,因此能够撼动群体层面的集体记忆筛选、提取过程,打破原有记忆提取过程中出现的遗忘现象。在整个记忆系统中,信息的编码具有不同的层次水平,在对外界信息刺激的感知过程中,新的知识与体验融入旧的知识与体验,认同过程无疑为一个反复加深刺激输入的过程。认同所涉及到的个体自我的整合、与社会环境的整合、个体自我体验的内在一致性与连续性都是对集体记忆信息的再编码、再巩固。社会认同本身也无法缺少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整合。

（三）基于国家认同的集体记忆建构

集体记忆可以被定义为对过去所有想法的总和,这些想法在特定社会中,在特定历史时刻占据主导地位,并发展成某种可以被称为“常识”的东西,为大多数人所接受(Rauf, 2009)。个体对公共事件的记忆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经验有关,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国家认同。共享的记忆或纪念仪式所营造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归属感成为群体和国家认同的基石(钱力成, 张翩翩, 2015)。集体记忆所包含的关于国家的体验和情感是国家认同基础的一部分,同时国家认同所包含的成员身份信息 and 承诺因素也是与国家相关的集体记忆得以形成的要素之一。集体记忆在国家这一共同体中被共享,与共同体认同息息相关。集体记忆的叙述图式模板被社会成员所接受,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就会成为稳定的跨越代际的国家记忆。

与自传体记忆相关的私人事件记忆不同,国家认同更多涉及的是对公共事件的记忆。当自传体记忆随时间的进程趋于衰退时,通过与拥有共同经历的其他社会成员接触与沟通,周期性的对相关记忆进行强化与再巩固,集体记忆内容就会被再编码、再存储。当讨论国家的集体记忆时,这些记忆并不都是情景记忆,也可能是语义记忆。如个体有可能亲身经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形成了基于对这一时间点的集体记忆;又或个体并没有亲身经历与国家相关的集体记忆事件,如“甲午海战”这一事件的集体记忆在中国人心中更类似于一种常识性知识。许多记忆与直接经验无关,而是通过文化媒介或面对面交谈此类间接经验形成记忆,而亲身经历过公共事件的人可能更倾向于用个人的、自传式的相关事件来描述其回忆。

集体记忆通过口头交流(communivative memory)和物质信息记录(文化记忆的形式)两种渠道维持(Yu, et al., 2014; Momennejad, 2019)。一些过去语义集体记忆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和日常交流(复述、实践、纪念活动)在代际间传递,集体记忆的传递伴随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个体

通过在社会中不断确认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自觉地将身份归属于群体,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对自身所归属群体过去发生过什么的经验性知识,由高度联结的或稀疏联结的集群网络成员通过不同的形式传递。尽管许多关于国家公共事件的记忆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亲身经历,但是在集体记忆的加工以及传递过程中却逐渐演变为常识性共识,其中社会成员对认同的分享过程无疑参与了集体记忆最初在群体成员中的编码过程。认同可以促进人们对集体记忆共识性内容的再巩固,也可以使集体记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显现出完全不同的记忆内容。这一特点再一次证明认同在集体记忆提取过程中的建构性。

总之,关于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意义深远:一方面,集体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的填充剂,集体记忆同人类的许多心理特征一样根植于社会情境与结构,常被作为支撑国家认同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集体记忆在编码、存储以及提取过程中也被国家认同过程所建构、解释与强化。如,有研究发现,新闻对“提及历史”的使用情况影响着读者的个人记忆,进而最终影响社会的集体记忆,包括对国家认同的表征(Le,2006)。基于认同建构集体记忆的传递,不仅具有维持自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连续性和同一性的意义,还具有保持国家文化、认同等连续性的功能,即集体记忆体现的建构功能,而非简单的对历史原貌进行恢复。

此外,集体记忆繁荣了有关创伤记忆领域。在对慰安妇的创伤记忆研究中,博物馆等纪念设施是重构公共记忆的重要场域,可从民间交流、媒介传播、雕塑和纪念场馆等公共领域促成创伤记忆的固化,重构公共记忆(刘喜涛、曹大臣,2018)。集体记忆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通过一系列对历史连续性的探索性发现,佐证了集体记忆的角色并非根据潮流而重新洗牌,而是根植过去、着眼现在、期望未来的连续性线索,塑造着人们对自我乃至社会的认同。

四、集体记忆的社会传递过程

集体记忆如若作为个体现象,即为在认知层面上讨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就过去所发生事件的记忆达成一致的过程;集体记忆如若作为一种群体现象,即为在社会层面上讨论社会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大型群体的集体记忆形成过程。其本质都是在讨论集体记忆是如何逐渐趋同与巩固,并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均可以公开获取的符号体系。既然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都难以做到对原本发生事件的完全还原,准确的描述过去的经历就无以成为记忆研究的核心追求,单独对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分类别研究也不足以描述人类记忆活动的复杂性。

集体记忆不仅是被记录下来的内容,行为模式、言语符号实际上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个体记忆研究者基于现代信息加工理论提出的人类记忆信息加工模型不同,集体记忆根植于社会环境,回忆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受到社会框架的影响。那么,集体记忆的痕迹是如何损失掉一些材料,又最终保留了一种面貌?个体记忆是如何借由叙述沟通被共享、重塑、认同,并通向外部世界成为集体记忆的?这些疑问需要以加工过程为起点,从不断变化着的“现在”对“过去”进行更新和重塑。

集体记忆根据其特征可以划分为衰减速度和关注程度,进而可以形成4种类型:(1)关注度高但衰减速度快;(2)关注度高但衰减速度慢;(3)关注度低但衰减速度慢;(4)关注度低且衰减速度快。集体记忆传递并不是简单的基于时间进程,它在人类社会中历久弥新,即使会出现暂时占据人们视野的新内容,但有些集体记忆是难以被遗忘的(Yu, et al.,2014)。社会信息、符号互动以及认同对集体记忆中共同的过去进行共享、重塑与建构,是基于累积性的建构过程还是穿插式的建构过程仍有待进一步证明。

另外,即使集体记忆衰减(概括化)是整个集体不可避免的现象,但集体记忆容量或许与个体记

忆一样具有某种恒定性,因此其传递过程同样要经过某种筛选过程,以保证社会成员最大限度的适应当下的生活。这一过程不仅包含心理过程,而且包括社会过程,个体记忆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媒介记述和传递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集体记忆也同样涉及大脑对信息的编码、存储与提取。

集体记忆传递与个体记忆传递也可探寻到其相似性,即基于社会成员对记忆信息接受和拒绝的过程。集体记忆信息一旦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就会进入上行通道,被进一步共享、重塑,最终达成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从而进入下一个集体记忆强化、再巩固的循环;但接受一部分集体记忆信息,就意味着拒绝和遗忘一部分信息,记忆内容会滑入下行通道,被抑制、提取困难,最终逐渐消失。这一过程也就是集体记忆逐渐概括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划分,主动过程常伴随着个体对自身相关信息的优先处理加工,被动则意味着集体记忆受到他人、环境、社会框架的影响而进行筛选、编码、存储、提取。接受则集体记忆传递,拒绝则集体记忆逐渐衰退。集体记忆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追溯,其时间进程跨度较大,个人的经历无法完全处于私人领域,而是嵌入在公共领域当中,与社会网络结构相联结。

由此,集体记忆传递的信息、符号互动、认同三维结构模型可将集体记忆筛选及传递过程展现为三个通道:(1)群体成员对集体记忆相关信息的共享过程;(2)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符号之间的互动对集体记忆的重塑过程;(3)置于社会框架中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另外,这三个结构维度既伴随着个性化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群体的普遍化过程。

实则集体记忆现象是灵活繁复的,它深深地扎根于某种社会文化本身,为这一文化覆盖下的社会群体成员所接受,并构成世代传递的集体记忆保存途径。再者,这一过程只是涵盖了那些被诉说、分享出来的集体记忆内容,至于下行途径中的集体记忆内容,是否真的完全消逝也未可知。被抑制的集体记忆在特殊情况下是否会被重新提取出来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也有待探究。例如那些被压抑了的创伤性的集体记忆内容,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可能会被重新纳入社会系统,进入集体记忆传递的再循环当中。即使集体记忆的原貌已经难以窥探,但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集体记忆本身的意义或许本就不在于恢复历史原貌,而是在于探究群体中的个体如何参与到集体记忆的传递机制当中,社会网络结构又如何影响人们对集体记忆的分享、重塑与建构等。

五、讨论与展望

首先,心理实验中的记忆研究控制许多额外因素,也因此获得了概念量化的突破,而集体记忆则假设记忆总是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无法孤立地对其进行考察,因此也面临着研究范式突破上的难题。集体记忆的概念本身涉及对过去的某种表征,是社会成员对过去发生事件的“心照不宣”,表征则意味着人们通常假定过去是一种常识性知识,人们会默认关于集体的记忆不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因此,记忆准确性的评估在集体记忆中是否适用便存在争议。

其次,研究集体记忆的过程、结果以及如何被集体化,如果不知道集体记忆是如何在社会中具体表现则无法切入集体记忆内部。集体记忆研究同样涉及仪式性文字和行为,如庆典可以通过凸显文化符号、与历史的勾连能力以及对当前现实的诠释,既可以复活旧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制造新的集体记忆(薛亚利,2010)。当前也有新型式的集体记忆表现,如数字记忆银行、网上灾难性事件纪念、数字档案馆等。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界限也因为线上网络的发展变得更为模糊。数字、网络等纪念方式,对集体记忆是否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再者,集体记忆研究不仅关注人们对记忆的“陈述”,也同样关注记忆“行为”。已有研究更多涉及集体记忆如何描述过去,而作为记忆研究不可或缺的社会范畴,应重视社会和文化维度在构建这

一概念时的核心地位。哈布瓦赫认为对记忆的内容进行交流为形成集体记忆提供了一种基础。他更进一步提出,个体即便是独自回忆某一事件,个体也是在与想象中的客体进行对话(Hirst & Echterhoff,2012)。集体记忆的社会属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将其置于一种宏大叙事中,而非一味追求实验室准确性,要将其置于一种群体中或群体间冲突与协商的方式来表达与理解,如对集体记忆如何导致大规模群体行为的预测。

另外,集体记忆是否涉及群体层面的适应单元,通常研究更多讨论关于群体外物层面的适应,如资源获得与利用,而群体是否也存有认知活动层面的某些适应性,比如学习,合作,决策?集体记忆是否是群体的某种心理或认知性适应策略?这一适应性策略影响下的集体记忆是否是对集体过去共享、重塑与认同背后重要的驱动力之一,这仍旧是集体记忆产生机制值得探索的角度。集体记忆是由社会文化、价值观、习俗等组成的复杂网络,集体记忆研究不仅要关注对过去的理解,更要关注它对集体未来的指向性。无论是基于适应性的机制,还是基于推动未来重塑过去的机制,都是无疑包含一种连续性、持久性、可塑性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复杂关系。

当然,集体记忆研究无法缺少对于情景记忆的讨论。情景记忆可以被理解为对事件模拟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认知态度,情景记忆不应该等同于对过去的信念,相反,人类情景记忆的内容往往是为这些信念的辩护而构建的(Mahr & Csibra,2017)。情景记忆将纯粹的个体事件作为个人体验保存起来,它虽然可以被交流或交换,但无法在个体间传递。除非通过外在的表现而改变经验的性质(阿莱达·阿斯曼,2017)。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在回忆或与他人分享过去,而情景集体记忆是否因其特性而相比语义集体记忆更易编码或者提取,仍有待深入探究。集体记忆研究与社群密不可分,因此也要了解群体结构的重要性,甚至虚拟网络社群结构在现代集体记忆传递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研究发现,“微博”或“Twitter”等社交网站的结构特征,即无关信息干扰和反馈会导致对信息理解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会进一步扩展到离线阅读任务中,其原因在于认知超载(Jiang, et al.,2016)。信息通信方式、获取方式在更新变化,集体记忆面临信息冗余、认知超载、社会网络结构更加复杂多元,这些认知负荷是否会导致集体记忆损失的信息更多,更趋于简化与一致,进而使其原貌更加抽象化、概括化?还是会导致人们逐渐对集体记忆形成更高水平的适应单元,也非常值得结合微观与宏观层面加以深掘。

参考文献:

- [德]阿莱达·阿斯曼,2007:《回忆有多真实》,[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德]阿莱达·阿斯曼,2017:《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转换》,教佳怡译,《学术交流》第1期。
- 柴民权、管健,2018:《从个体认同到国家认同:一个社会心理路径》,《南京社会科学》第11期。
- 刘喜涛、曹大臣,2018:《创伤与记忆:“慰安妇”的私密创伤与公共记忆重构》,《南京社会科学》第11期。
- 刘亚秋,2010:《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第5期。
-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钱力成、张翩翩,2015:《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薛亚利,2010:《庆典: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Berger, J. & K. L. Milkman, 2012, “What Makes Online Content Viral”,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 49, No. 8, pp. 192—205.
- Castellano, C., S. Fortunato & V. Loreto, 2009, “Statistical physics of social dynamics”,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Vol. 81, No. 2, 2009, pp. 591—646.
- Centola, D., 2011,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homophily in the adoption of health behavior”, *Science*, Vol. 334, No.

6060, pp. 1269—1272.

Choi, H. Y., E. A. Kensinger & S. Rajaram, 2017, “Mnemonic transmission, social contagion, and emergence of collective memory: influence of emotional valence, group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 146, No. 9, pp. 1247—1265.

Coman, A. & W. Hirst, 2015,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The effects of group membership”,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 144, No. 4, pp. 717—722.

Coman, A., C. B. Stone & E. Castano, et al., 2014, “Justifying atrocities: The effect of moral-disengagement strategies on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5, No. 6, pp. 1281—1285.

Congleton, A. R. & S. Rajaram, 2014, “Collaboration changes both the cont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memory: Building the architecture of shared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 143, No. 4, pp. 1570—1584.

Hirst, W., A. Cuc & D. Wohl, 2012, “Of sins and virtues: Memor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Radiology*, Vol. 14, No. 9, 2012, pp. 52—55.

Hirst, W. & G. Echterhoff, 2012, “Remembering in conversations: The social sharing and reshaping of memor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63, No. 1, pp. 55—79.

Hirst, W., E. A. Phelps & R. Meksins, et al., 2015, “A ten-year follow-up of a study of memory for the attack of September 11, 2001: Flashbulb memories and memories for flashbulb ev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 144, No. 3, pp. 604—623.

Jiang, T., Y. Hou & Q. Wang, 2016, “Does micro-blogging make us “shallow”? Sharing information online interferes with information comprehens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59, No. C, pp. 210—214.

Jovchelovitch, S., 2012, “Narrative, memory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 Behavioral Science*, Vol. 46, No. 4, pp. 440—456.

Koppel, J. & D. Berntsen, 2015, “The peaks of life: The differential temporal locations of the reminiscence bump across disparate cueing method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 Cognition*, Vol. 4, No. 1, pp. 66—80.

Koppel, J., D. Wohl & R. Meksins, et al., 2014, “The effect of listening to others remember on subsequent memory: The roles of expertise and trust in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and social contagion”, *Social Cognition*, Vol. 32, No. 2, pp. 148—180.

Le, é., 2006,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ditorials”, *Journalism Studies*, Vol. 7, No. 5, 2006, pp. 708—728.

Loftus, E. F., 2005, “Memories of things unsee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3, No. 4, pp. 145—147.

Luhmann, C. C. & S. Rajaram, 2015, “Memory transmission in small groups and large networks: An agent-based model”,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6, No. 12, pp. 1909—1917.

Mahr, J. & G. Csibra, 2017, “Why do we remember?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episodic memor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 19, No. 7, pp. 1—93.

Momennejad, I., A. Duker & A. Coman, 2019, “Bridge ties bind collective memori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 10, No. 1, pp. 1578.

Rajaram, S. & L. P. Pereira-Pasarin, 2010, “Collaborative memory: Cognitive research and theor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5, No. 6, pp. 649—663.

Rauf, G., 2009,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Azeri youth)”, *The Caucasus & Globalization*, Vol. 3, No. 1, pp. 104—113.

Reysen, M. B. & S. A. Adair, 2008, “Social Processing Improves Recall Performance”,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

view, Vol. 15, No. 1, pp. 197—201.

Saint-Laurent, C., 2017, “Memory acts: A theory for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Vol. 31, No. 2, pp. 1—15.

Stone, C. B., A. J. Barnier & J. Sutton, et al., 2010, “Building consensus about the past: Schema consistency and convergence in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Memory*, Vol. 18, No. 2, pp. 170—184.

Wang, W., M. Tang & H. F. Zhang, et al., 2015, “Dynamics of social contagions with memory of nonredundant information”, *Physical Review E Statistical Nonlinear & Soft Matter Physics*, Vol. 92, No. 1,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E.92.012820>.

Weldon, M. S. & K. D. Bellinger, 1997, “Collective memory: Collaborative and individual processes in remember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Vol. 23, No. 5, pp. 1160—1175.

Wertsch, J. V., 2002,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rtsch, J. V., 2008, “The Narrativ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Ethos*, Vol. 36, No. 1, pp. 120—135.

Wertsch, J. V. & H. L. Roediger, 2008, “Collective memory: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Memory*, Vol. 16, No. 3, pp. 318—326.

Yu, A. Z., K. Z. Hu & D. Jagdish, et al., 2014, “Pantheon: Visualizing historical cultural production”, *Visual Analy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ST). IEEE*, No. 11, pp. 289—290.

(责任编辑:李曙光)

The Psychosocial Logic of Collective Memory Transmission: Sharing, Reshaping and Identification

GUAN Jian, GUO Qianlin

Abstract: Collective memory is not only individual memories that are shared and exist in the community but also a system of symbols that are accessible to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e operation of society is maintained by collective memory, whil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mission is maintained by soci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collective memory can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wo characteristics: rate of decay and attention level. According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fer is considered to be a selection process based on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information. The selection process involves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the re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by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constructing of identity. Therefore, neither “de-psychologization” nor “de-socialization” can fully expand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 Exploring how collective memory is transmitted in society requires an attempt to complement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this field.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information sharing; symbolic interac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bout the authors: GUAN Jian,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GUO Qianlin, is PhD Candidate in Social Psychology at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